

DOI: 10.6994/JET.202406_6(1).0004

全民阅读和数字素养时代下文献检索课教学改革探研 —— 以重庆科创职业学院为例¹

The Era of Universal Reading and Digital Literacy:
Exploring the Reform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Teaching — Taking Chongqing College of Science and
Creation as an Example

殷朝华*
Yin Chao Hua

邵魁德**
Shao Kui De

摘要: 中国大学的“文献检索”教育的兴起是1984年。课程初衷是通过文献检索和利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的研究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的提升，必须借助于计算机、互联网和数据库，必须依靠文献检索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和数字应用能力，这便是信息素养教育的新要求。本文就传统的文献检索课进行分析、研究、实践，提出“阅读教育”、“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三融合教育，重新定位文献检索课，以至达到较好教育效果。

关键词: 阅读教育，信息素养，数字素养，文献检索

Abstract: The rise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dates back to 1984.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course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independent research ability through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utilization. With

¹ 本文系重庆市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全民阅读及数字教育背景下的文献检索课教育改革研究与实践”（Z232047）研究成果之一。

* 殷朝华，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教授、副校长。Email:30151917@qq.com

** 邵魁德，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图书馆馆长。Email:1425590659@qq.c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research ability must rely on computers, the internet, and databases, and must rely on literature retrieval ability, literature reading ability and digital application ability, which is the new require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By analyzing, researching, and examining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three pronged education system that integrates "reading education",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digital literacy" to reposition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s and achieve better educational results.

Keywords: Reading education, Information literacy, Digital literacy, Literature retrieval

一 前言

1984年由董文喜在《高等学校的阅读教育》一文中提出：为使学生了解、利用图书馆，为使学生会阅读、懂检索、能鉴别、善利用各种文献资料，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就是阅读教育（董文喜，1984）。换句话说，阅读教育是教学生如何收集文献、如何阅读文献、如何利用文献、如何做学问的方法。学习、阅读是所有教育成就的核心，中华民族自古崇尚读书，阅读不仅仅是承继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更是个人发展必需的一部分。

1.1 全民阅读时代阅读教育的重定位

全民阅读是指全社会、全体人的阅读。全民阅读是根据“世界读书日”演变而来，世界读书日设立的目的就是推动更多人阅读和写作（中央宣传部，2015）。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提出关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全民阅读”活动，是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新闻出版总署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而提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全民阅读活动正式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内容中，将全民阅读提升到了战略层面的高度（张舒，2022）。中国第一部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于2016年底发布（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2021年中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与《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两个重要文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也明确了数字素养教育将是中国教育的重点工作之一（中国新华社，202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也指出，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化全民阅读活动（中国党建网，2022）。2023年3月，中国教育部、中国中央宣传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并印发《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四大要求：丰富学生读书内容；创新读书行动载体；健全读书长效机制；认真做好组织实施。要求将读书行动与学校教育教学、课后服务活动和学生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中国教育部等，2023）。全民阅读既是全社会的阅读，那就离不开学校教育。学校原教育在如何收集文献、如何利用文献、如何博文强记做学问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系统传授功能不足，承担起这个任务的是阅读教育。学校应系统化设计阅读教育，使之成为全民阅读的引擎。

1.2 国内外阅读现状对比的重思考

浙江工业大学季亚娟等老师，曾设计问卷，针对国内外阅读情况进行网络调查。中国大学调查范围为部分本科院校的大一学生，主要分布地区为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外国大学的调查通过在海外的留学生发布网络问卷和个别访谈，分别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非中国籍大一学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汇总情况见表1：

表1 国内外阅读情况调查数据分析

序号	调查内容	中国 (%)		外国 (%)	
		是	否	是	否
1	平均每天阅读的文献量是否达到3万字以上？	18	82	85	15
2	平均每学期阅读的课外书是否达10本以上？	12	88	92	8
3	平均每学期阅读专业论文是否达到50篇以上？	17	83	89	11
4	在专业阅读过程中是否泛读比精读多？	25	75	85	15
5	阅读的内容来源是否4种以上？*	12	88	87	13
6	是否知道如何筛选阅读材料？	25	75	80	20
7	阅读专业书籍和论文时是否做读书笔记？	5	95	11	89
8	专业课老师是否要求学生阅读大量教材外的文献并提供书目或相关网站？	54	46	87	13

9	专业课老师是否要求学生写课外专业阅读文献综述或述评?	31	69	86	14
10	是否知道阅读材料的引用规则?	8	92	98	2
11	校内是否有读书节相关的活动?	86	14	0	100
12	阅读目的主要以兴趣所致还是为考好成绩或为找工作?	兴趣 33	成绩 67	兴趣 76	成绩 42

* 注：阅读文献来源的勾选范围为：报刊、教学参考书、专著、工具书、专利文献、标准文献、科技报告、会议文献和相关网络文献数据库或网站。

资源来源：季亚娟，王醒宇（2014）

从表1可以看出，国内外大学生的阅读情况存在差异。从阅读量和阅读面看，被调查的外国高校学生的阅读量明显高于国内学生，阅读文献的来源比较广，选择性阅读能力更强，阅读主动性稍强。外国高校教师对学生的阅读要求和阅读材料提供方面明显强于国内教师，对阅读材料的合理使用意识很强。国内86%的高校举办有关阅读推广活动，而所调查的外国高校却没有。中国大学生的阅读功利性比较强，阅读的目的多为考试，为兴趣而阅读的很少（季亚娟，2014）。中国大学生的阅读状况，导致综合素质下降，知识结构简单、断层，表现出文化底蕴和精神素养缺乏，文字功底低下等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以阅读能力为基础，才有信息素养等综合能力的提升。人们的阅读习惯是养成的，阅读能力是培养的。阅读教育不是研究单篇文章的阅读，更是对文献综合归类、分析、阅读，形成阅读体系，提高阅读能力和阅读素养，以达综合阅读能力的提升。因此，加强中国的大中小学生学习指导和阅读教育成当务之急。

二 文献检索课的阅读、信息、数字三融合教育

文献检索课的目的是通过训练文献检索技能，来提升学生对文献信息的获取能力、鉴别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但是目前中国大学的文献检索课的现状更多是集中在文献检索的技能上，其他方面有所缺失。

2.1 文献检索课的实施困境

今天在全民阅读和数字素养环境下，文献检索课应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更广的技术技能和更全面的知识体系。中国教育界也在探索研究课程的拓展和知识体系的重构，目前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困境：

(1) 课程体系是否延续的困境。传统的文献检索课主要集中在数据库的检索技能上。随着搜索引擎的普及，人们对于一站式检索再熟悉不过了，因此对于是否有必要开设这门课程，是否延续原始的教育方式存在很大争议。

(2) 课程开设主体的困境。这门课程道底由谁主开，是图书馆还是通识教育部门？按理作为一门通识课程，应由通识教育部门或基础部负责开设，但历史地落在了图书馆的肩上。这与课程开设初衷有关，初衷就是要充分发挥图书馆文献资源、图书馆专业师资的作用。由此可知，现代的文献检索课（信息素养教育课）可以由图书馆主开，也可由通识教育部门主开。

(3) 课程内涵界定的困境。传统的课程内容是工具书应用和数据库检索。由于数据库的丰富和网络资源的便利，工具书的应用几乎消失。现代的课程追求素养教育，即意识素养、技能素养和应用素养等。从素养的角度来看，传统课程的内涵应加以明确。

(4) 课程外延界定的困境。“文献检索”在新时代称为“信息素养教育”。“信息”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知识、文献、文本、方案、文章等内容和信息。“素养”更是人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信息素养”简单说就是对待“信息”的能力。这样理解，信息素养就应包含信息检索、信息阅读、信息识别、信息综合分析、信息检索技能、数字工具应用、信息利用与创作等。因此课程外延的界定应与信息素养教育外延相同。

2.2 文献检索教育到信息素养教育

信息素养又称信息素质、信息教养，这一概念是从图书检索技能演变发展而来的，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于1974年提出。他将信息素养定义为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利用信息的技术和技能，即从各种不同信息源获取、评估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庞慧萍，2022）。信息素养教育就是培养个体信息素养的教育，使受教育者能够具有信息应用、信息能力、信息技术、信息道德的综合能力。

中国大学的“文献检索”教育的兴起是1984年中国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84]教高字004号）。课程初衷是通过文献检索和利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的研究能力（中国教育部，1984）。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计算机、互联网、数据库登上了历史舞台，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提升必须依靠计算机和数据库。在全民阅读和数字素养的时代背景下，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必须依靠文献检索能力、文献阅读能力、数字应用能力，这便是信息素养教育的新要求。早在2002年2月，中国教育部就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在总则的第3条明确规定：“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培养读者的信息意识和获取、利用文献信息的能力”（中国教育部，2015）。中国国家层面早就将信息素养教育列入了学校教育的内容。

2.3 信息素养教育到数字素养教育

“文献检索”需要“文献阅读”，“文献阅读”影响着“文献检索”，也影响着“文献分析”和“文献利用”。“文献阅读”最初指传统的纸质文献阅读，当今的阅读不仅指纸质文献阅读，而更多是指数字文献的阅读。检索、阅读、数字应用是紧密相连的“三兄弟”。信息素养主要是指信息意识、信息检索、信息阅读、信息应用、信息道德；数字应用今天处处可见，手机查阅、电脑检索、APP的应用、数字文献编辑、数字软件的应用等。一句话，数字时代处处离不开数字效力。信息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数字应用能力。若要提升阅读效力和信息检索效力，必先提升数字的驾驭能力和应用能力。有学者分别对中国杭州地区16所高校、中国广州大学城10所高校的大学生的阅读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杭州地区“高校的学生课余时间主要用于上网和阅读书报刊，两者的比例分别占81.7%和51.5%”；广州地区“76%的学生课余时间用于上网”（王欣欣，2011）。数字阅读改变了传统的阅读习惯，也影响着人们的阅读思维。信息素养教育向前依靠阅读教育，向后依靠数字素养教育。在此情况下，开展“阅读+信息+数字”三融合教育或成该门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孙平，2006）。

三 文献检索课教学改革及体系重构

据调查了解，中国本科院校有半数以上学校没有开设文献检索课，高职院校开设文献检索课的学校不到20%，且开设的学校教学内容单一，多数还是停留在图书馆利用、数据库文献检索上，课时偏少，选修居多，深度不够（刘海涛，2018）。文献检索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培养学生快速阅读、分析文献信息，提取要义进行加工和创作。文献检索课应从阅读教育、信息素养教育、数字素养教育入手。阅读是产生新思维、新思想、新境界的重要途径；信息是思维、灵感、智慧的源泉；数字是时代发展的信息载体，是新时期阅读信息承载的形态，是知识、信息应用的升华，是创造提高的手段和新应用的助手，三者相互承接。只有三者结合，才有信息素养的提升、才有数字能力的提升，才有创新意识、综合素养的提高（王泽龙，202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从2019年开始，对文献检索课进行改革和知识体系重构。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重构、重编新版教材，开展了阅读教育、信息素养教育和数字素养教育三融合教育，重构了阅读+检索+数字训练项目，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3.1 知识体系的重构

随着阅读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和当今社会对终生教育、终身学习的重视，人们对阅读教育的关注度在增强。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教学团队经过多年教学实践研究，将“文献检索”课知识体系定位到阅读教育与信息素养提升高度，定位在阅读教育、信息素养教育和数字素养教育三融合教育。课程内容由三大部分构成：一、阅读及阅读教育，包括：阅读、思维、记忆、表达、写作等；二、文献及信息检索，包括：图书馆、互联网、数据库、检索技能、检索方法等；三、数字及数字应用，包括：图形创作发布、音频创作发布、视频创作发布、动画创作发布等数字应用和信息展示。知识体系的重构着眼于信息素质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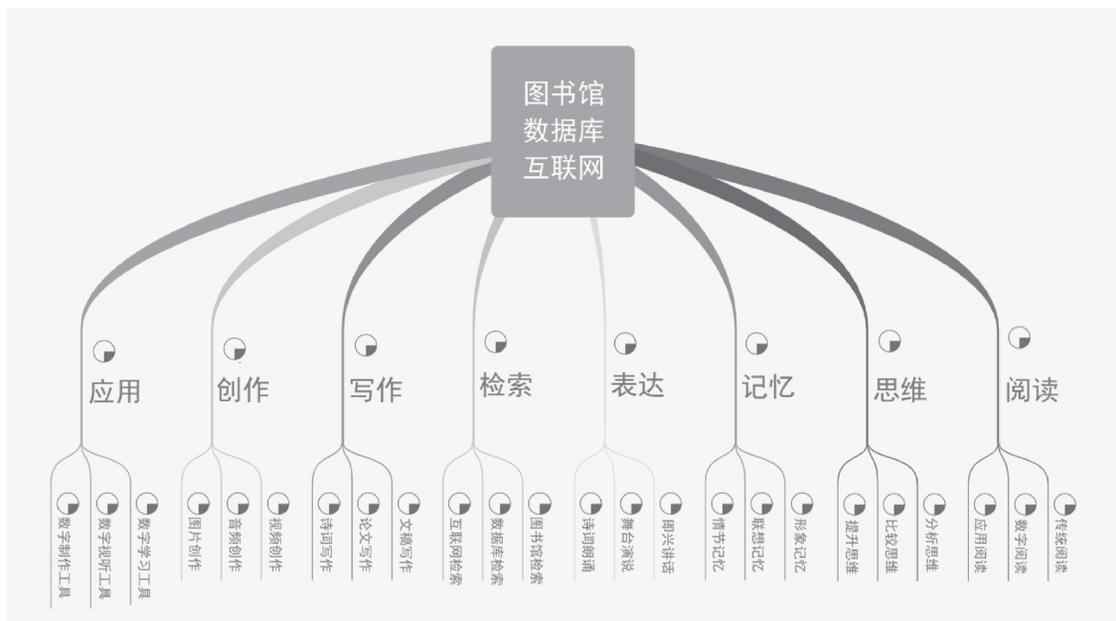


图1 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的知识体系结构图

资料来源：殷朝华，邵魁德（2022）

3.2 教材体系的重构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教学团队重新构建教材体系。由殷朝华教授编著《阅读与信息检索技术》新版教材，该教材2022年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应用性强，知识体系完整。该教材融阅读、信息、数字应用三融合教育。教材以项目教学为引导，条目式、指导性、范例式的编撰，是一部技能性较强的教学、实践指导书。教材在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增加了阅读部分（阅读教育），体现经典+文化+历史的立体式阅读和实践；增加了数字素养部分，体现阅读+信息+数字三融合教育。通过融合出版，书中配有50余个二维码，读者可以扫码数字阅读，增强记忆和理解。书中配有300余幅图示，便于记忆和掌握（殷朝华，2022）。学生们走进文山诗海、走进知识殿堂、走进网络云端、走进专业数据库。他们通过检索方法的学习，将知识条理化、秩序化、类别化。新版教材指导学生们阅读、检索和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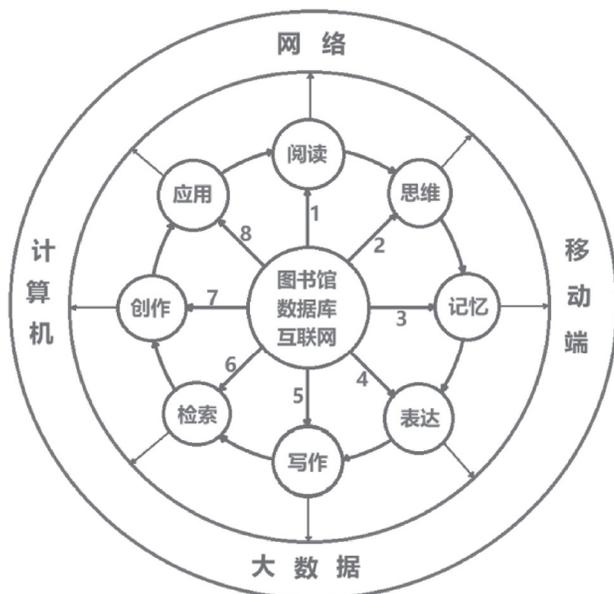


图2 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殷朝华，邵魁德（2022）

3.3 课程体系的重构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建立了完整的通识教育体系，将信息素养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建立较为完善的教学训练系统。本课程对大一新生全面开课，32学时、2学分。理论课与实操课分配比例是1:1，通过“智慧教育平台”开展数字化实习实训和作业完成，实现作业、训练从传统的纸质作业向数字作业模式转变。数字作业包含文本作业、音频作业、视频作为、图形作业、自媒体创作作业、动画创作作业等。经过几年的教学和成果积累，形成了较为丰富的阅读教育成果和创作成果，形成了项目式教学经验和成果化实训项目，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数字教学训练系统。

3.4 阅读内容的重构

阅读是一个人的基本功，也是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将阅读定位在“阅享悟道，咏诵树人”的高度。不夸张地说，没有阅读就没有成长，没有阅读就没有思维和视野，没有经典的阅读理解，就没有思想境界、品德的高尚。腹有诗书气自华，腹有诗书品德高。阅读首先在经典名句、名段、名篇阅读上，从经典的“四书五经”到历史、名著、诗

词、名篇，通过阅读体会深意，最终固化为个人的品质和行为。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将思政教育融入阅读教育之中（重庆科创职业学院，2023）。由校长陈流汀教授编著的经典阅读著作《论语今缀》，202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将《论语》重读、重编、重缀，内容归类为五常、五伦、五为、五向四个部分，便于阅读和理解（陈流汀，2022）。《论语今缀》做为经典诵读的范本，成为学生悟道的经典著作。

3.5 教学场所的重构

高校的教学行为通常是在教室和实训室完成的。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将该门课程教学场所定位在图书馆，体现环境育人：大楼+空间+设备；导师育人：馆员+学者+大师。阅读、教学、训练、创作均在图书馆进行，提倡“金山放牧”教学。每所大学都有建筑优美、资源丰富的图书馆，图书馆是教育的天堂、学研的宝地，素养教育课程定位在图书馆，就是要充分利用图书馆文献资源、图书馆场所资源、图书馆师资资源来教、学、研、创。素养教育课程定位在图书馆，不仅仅体现出一门课程，更体现出知识陶冶、信息运用、境界提升、环境熏染、阅读教育。这是一种新尝试，也是最接近自然学习的方式。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在2019年启用新建的2.2万平方米的新图书馆，内部设施齐全，大小研究空间20余间，报告厅、休闲阅读区、沙龙区、朗读区、检索区、工具书区、电子阅读区一应俱全。图书馆纸质藏书105万册，电子资源200余万册，电子阅览室配备品牌电脑，研究小间配备多功能一体机。图书馆社科类书籍占总藏书量的60%，其中文史类书籍占20%以上。图书馆成阅读教育和信息素养教育的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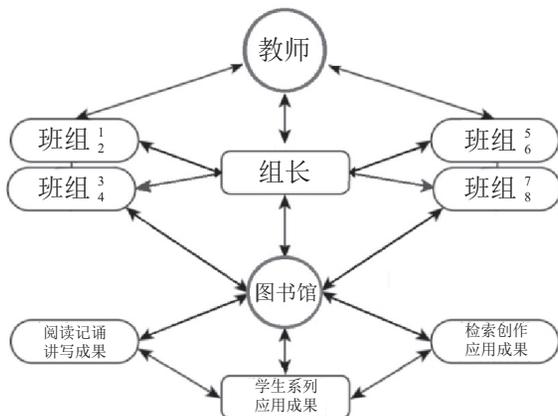


图3 信息素养教育课程实践开展流程图

资料来源：殷朝华，邵魁德（2022）

3.6 考核方式的重构

信息素养教育不能仅靠几次作业就完成了，素质表现在能力、成果、技能上。考核的定位是以形成成果为考核导向，以信息素养提升为考核目标，以量质阅读为考核点。阅读终极目的是读、思、记、用、创。结业和考核看最终形成成果的能力，防止读而不思，思而不记，记而不用，用而不能的情况发生。教与学都以形成成果为目的。重庆科创职业学院的文献检索课每年结合课程学习，分层次、分小组开展讲诵训练，如阅读分享、讲故事、赛诗词、演讲、演唱、名句名段诵读等，学生能做到脑中记故事、胸中有故事、口中讲故事、妙笔写故事。学生学为之用，用促之学，成果变学习的动力和抓手。信息素养既包含文化素养（阅读），又包含数字素养（检索、应用）。信息时代，心中有“信息”，脑中有“数字”，组织学员参与“信息素养大赛”“自媒体创作大赛”等，各式大赛也是成果。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是实实在在的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量质”阅读是另一个考核目标，首先阅读要有“量”，然后才有“质”。考核学员阅读的成效，先看在图书馆借了多少本书，再考核阅读质量，记住了多少词章和篇句，最后考核参加文化活动、读书活动、写作活动、表演活动的能力和效果。以文化人，以技赏人，以读树人（Celia et al., 2019）。

四 信息素养教育师资队伍的重塑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根据教学的需要，在教学实践中考核、重塑信息素养教育师资队伍，将教师的知识及涵养纳入重要的考核目标。阅读教育老师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老师要求学生学会的，首先自己学会。只有老师自己会，才会真正懂得哪是难点、哪是重点，才会懂得怎么去教、怎么去学，才会站在学生的角度领悟知识点。

（1）老师要带头学，成为领航能手。信息素养教育是人的教育，老师要同学生一起读、一起检、一起创。老师要求学生具备的素质，首先要自己具备。老师要有一定量的文学、历史、哲学、自然知识的积累和积淀，能够在课堂上自如解构知识、分析问题，成为学生阅读的引领能手（Bratsch et al., 2017）。

(2) 老师要带头思，成为敏思能手。在教学中，老师的个人思维很关键，他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思维，直接带动着学生的思考。老师应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和思想高度，有自己的思想境界和思维宽度，成为学生的榜样和崇拜者（Virinkoski et al., 2018）。

(3) 老师要带头用，成为技术能手。老师要能熟练运用电脑、手机、网络、APP，熟练掌握数据库检索、数字教学工具、自媒体创作工具，熟练应用图书馆知识和网络检索技能等，能熟练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将个人的信息素养传递给学生（靳璐，2021）。

(4) 老师要带头创，成为创作能手。老师的文学创作、信息调研创作、数字创作必有可少，老师应自如利用图书馆、互联网、数据库和数字工具开展原创作，并有自己的创作作品，实践中指导学生创作。

做为一名教师，若能做到“四带头”，成为“四能手”，定能在教学育人岗位做出出色贡献，成为优秀教师。通常我们指的“照本宣科”、“传话筒”式的老师，就是说这样的老师没有个人思维、没有个人的知识融通，只有照着教材宣读和介绍，不敢有一点个人的见解和主张，不敢发挥和扩展，更没有个人的成果和创作。这样的老师无论你多么热情、多么负责也是培养不出优秀学生的。

五 结语

当前，中国大学信息素养教育还处在发展期、探索期和体系重构期。根据全国开展的情况来看，还有待于体系完善，不断适应学生需求。根据学生的学习和收获情况，务实改进和落地。教改应站位于学生，而不是站位于老师。教改应立足于学生学的效果和收获，真正达到素养提升之目的。从学生能力的变化、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提升情况来考衡教改效果和教学效果。阅读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是智慧提升的最佳途径，体现“读书+行路+阅人”的三重价值。阅读是创造的源泉，是智慧提升的平台，是伟大人格产生的路径。新时代背景下，阅读能力、信息处理能力、数字应用能力，三大能力将为人的成长、成才插上翅膀。阅读、信息、数字三融合教育，外在表现出博文、强记、思想和技能，内在表现出境界、

文采、修为和修养（周仕德，2015），这便达到阅读树人，咏诵修身之目的。

参考文献

- 陈流汀（2022）《论语今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2023）我校图书馆荣获“重庆市高校图工委2023年创新案例”特等奖，取自<https://www.cqie.cn/contents/104/7531.html>
- 董文喜(1984) 高等学校的阅读教育,《图书馆学刊》，（1）：40-42。
- 季亚娟,王醒宇(2014) 国内外大学生阅读情况比较及高校图书馆阅读教育与推广的反思,《图书馆杂志》，33（8）：65-69,52。
- 靳璐,饶从满(2021) 美国中小学阅读教育：提升举措、实施效果及其制约因素,《比较教育学报》，（4）：88-103。
- 刘海涛,刘懿,周婕(2018) 基于“阅读推广+”的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基地联盟建设研究,《图书馆学刊》，（10）：31-36。
- 庞慧萍,宋美丽(2022)《信息检索与利用》，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孙平,曾晓牧(2006) 文献检索课走来·向信息素养教育走去,《图书馆论坛》，26（6）：252-255,261。
- 王欣欣,王慧秋(2011) 我国高校阅读教育现状与对策分析,《中国电力教育》，（2）：5-6。
- 王泽龙(2023)《文献检索》的课程改革与创新研究,《山西青年》，（1）：81-83。
- 殷朝华,邵魁德(2022)《阅读与信息检索技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张舒(2022)《全民阅读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评价体系研究》，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国党建网(2022) 党的二十大报告,取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7757098192120827&wfr=spider&for=pc>
- 中国教育部(1984)《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的通知(84)教高一字004号),取自<https://wenku.baidu.com/view/11d6a1266f175f0e7cd184254b35eefdc8d315c3.html>
- 中国教育部(2015)《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取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9%80%9A%E9%AB%98%E7%AD%89%E5%AD%A6%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8%A7%84%E7%A8%8B/12625136?fr=ge_ala

中国教育部等（2023）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取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9B%BD%E9%9D%92%E5%B0%91%E5%B9%B4%E5%AD%A6%E7%94%9F%E8%AF%BB%E4%B9%A6%E8%A1%8C%E5%8A%A8%E5%AE%9E%E6%96%BD%E6%96%B9%E6%A1%88/62824905?fr=ge_ala

中国新华社（202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取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6%B0%91%E7%BB%8F%E6%B5%8E%E5%92%8C%E7%A4%BE%E4%BC%9A%E5%8F%91%E5%B1%95%E7%AC%AC%E5%8D%81%E5%9B%9B%E4%B8%AA%E4%BA%94%E5%B9%B4%E8%A7%84%E5%88%92%E5%92%8C2035%E5%B9%B4%E8%BF%9C%E6%99%AF%E7%9B%AE%E6%A0%87%E7%BA%B2%E8%A6%81?fromModule=lemma_search-box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取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6%B0%91%E9%98%85%E8%AF%BB%E2%80%9C%E5%8D%81%E4%B8%89%E4%BA%94%E2%80%9D%E6%97%B6%E6%9C%9F%E5%8F%91%E5%B1%95%E8%A7%84%E5%88%92/20350967?fr=ge_ala

中央宣传部（2015）全民阅读，取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6%B0%91%E9%98%85%E8%AF%BB/4155056?fr=ge_ala

周仕德(2015)美国的阅读教育:政策、趋向及启示,《外国中小学教育》,(1),16-22。

Bratsch, M., Feagans, L., Varghese, C., & Garwood, J. (2017). Child Skills and Teacher Qualifications: Associations with Elementary Classroom Teachers' Reading Instruction for Struggling Readers.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 Practice*, 32, 270- 283.

Celia, O., Joao, L., Louise, S. (2019). Teachers'academic training for literacy instru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2(3), 315-334.

Virinkoski, R., Lerkkanen, M., Eklund, K. (2018). Teachers' Ability to Identify Children at Early Risk for Reading Difficulties in Grade1.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46), 497-509.